

胡煦思想研究(共3篇)

编者按:胡煦是清初一位重要的易学家、理学家,他的思想有很多独到之处,对《周易》尤为精通。牟宗三在他早年的第一部著作《周易的自然哲学与道德涵义》中,发掘了胡煦的易学思想,并称胡煦是中国的最大之纯粹哲学家,认为胡煦的思想是中国哲学史上最有系统最有见解的思想体系。近年来,海内外对胡煦思想的研究逐渐增多。胡煦易学思想研究被列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,胡煦著作《周易函书》点校整理被列为教育部全国高校古籍整理重点科研项目,胡煦理学思想研究被列为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。因此,对胡煦思想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,已成为学术界一项重要的、迫切的任务。为此,我们约请了海内外一些专家学者撰文对胡煦思想进行了专门的研究,希望能够引起学界的关注。今后本刊将继续开设“胡煦思想研究”专栏,恳望海内外专家学者不吝赐稿,以推动胡煦研究的不断深入。

关键词:胡煦;易学思想;理学思想

中图分类号:B249.9 **文献标识码:**A **文章编号:**1003-0964(2006)03-0001-13

胡煦纳甲说的内容、意义及其学术转向

林忠军

(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,山东 济南 250100)

胡煦,河南光山人,生活在康乾盛世,是当时著名易学家和理学家,一生潜心研究《周易》,曾为康熙帝讲《易》而受到称赞,康熙下诏纂《周易折中》,大学士李光地为总裁,命胡煦为分纂官,参与撰写《周易折中》,著有《周易函书约存》、《周易函书约注》、《周易函书别集》等。其易学“酌于汉学宋学之间”,精于义理,而不废象数。就象数而言,言体卦、纳甲说、河图洛书、先天后天、天根月窟等。其中纳甲说是他象数易学的重要内容,体现了其易学折中于汉宋的特点。

何谓纳甲?所谓纳甲是将历法中的天干纳入《周易》的八卦之中,与八卦相匹配,以揭示八卦消息变化之义。天干以甲为首,以甲概其余,故称纳甲。宋代朱震曾明确指出:“纳甲何也?举甲以该十日也。乾纳甲壬,坤纳乙癸,震巽纳庚辛,坎离纳戊己,艮兑纳丙丁,皆自下生。圣人仰观日月之运,

配之以坎离之象,而八卦十日之义著矣。”^{[1]卷中}

纳甲之说最早见于汉初《京氏易传》,东汉魏伯阳以月体言纳甲,并以此解说炼丹理论,三国虞翻曾以月体纳甲注释《周易》。南宋朱震以虞氏纳甲说画出纳甲图,并把纳甲列为易学五法之一。后世丁易东、项安世、吴澄等人沿袭之,皆取之注经。然而,易学史上反对纳甲不乏其人,如魏晋王弼尽黜两汉象数,公开批判包括纳甲在内的汉儒取象方法;宋儒程颐赞赏王弼易学,不谈纳甲;朱熹认定纳甲不可诋毁,却认为纳甲非为易而设^{[2]卷38}。俞琰等人认为,纳甲之法与经文不符,“惟术家用之,于易无预焉”,是后人之附会^{[3]卷3}。为了解决易学史上这一问题,胡煦把纳甲作为易学一个重要问题加以探讨,经过长期潜心的研究,他摆脱了注经形式的束缚,建立了更加完备、更加系统的纳甲学说。

收稿日期:2006-02-22

作者简介:林忠军(1960-),男,山东莱阳人,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教授,博士生导师;汪学群(1956-),男,北京人,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;程林(1963-),男,河南光山人,信阳师范学院政法学院讲师。

一、纳甲之法,上古圣人设之以明易

胡煦从起源探讨了纳甲问题,认为纳甲之法是上古圣人创立,圣人为了明易,仰观天文而发明了纳甲,纳甲发明早于文王,即在文王之前就已有纳甲。他批判了将纳甲说视为术数的看法,认为纳甲起源早,而术数产生则晚。在纳甲产生时,根本没有术数,因此纳甲绝非术数家所为。他说:

纳甲之法,上古圣人仰以观于天文,因设之以明易,非术数家所能作也。见于卦辞曰“先甲后甲”,是文王之前已有纳甲矣。见于爻辞曰“先庚后庚”,是周公之前已有纳甲矣。夫文王周公之时,固未闻有所谓术数也。术数之可考者,始见于《越绝书》与《吴越春秋》。或亦战国术数之士袭日月交光之说,因吉凶祸福之言,盗其灵机,推广义例,因纪其光交之位,目为纳甲,以惑愚蒙,欺当世耳。然所重在交而不在位,甲乙丙丁皆其象之寄焉者耳。今但目为纳甲,则是袭其皮肤,而忘其神理矣。术数之传,惟火珠林以钱代蓍,犹与易数相符,试之占卜,每有征验。至于禄马贵人,乖于易理,绝无可验,斯其伪作,不近道理,亦已明甚。即其有取于纳甲,亦绝无纳甲可用之处,亦绝无纳甲可验之时,而考诸日月交光,实与易理绝有关系,其妙皆出于先天八卦图与文王后天图。^{[4]卷首上}

从他论述看,胡煦这里以时间先后说明了纳甲与术数之间的区别。按照他的说法,虽然纳甲与术数有着某种联系,即术数“袭日月交光之说,因吉凶祸福之言,盗其灵机,推广义例”,借助于纳甲建立了自己的理论,但是,《周易》纳甲与术数纳甲有着本质差别,从时间先后说,纳甲早于术数,考《周易》卦爻辞蛊卦“先甲三日,后甲三日”,巽卦“先庚三日,后庚三日”,推知西周以前纳甲已产生,但此时未闻术数。

先甲后甲,文王引之入经;先庚后庚,周公引之论爻。则是纳甲之说,文周之前固已有之,道理极深,与天运相契,所以孔子释为天行,此岂术数家所能辨乎?^{[5]卷5}

因此,术数的产生是在战国时期。从内容看,术数讲纳甲,只取其皮毛,而未涉及纳甲本质,“其道理浅陋,虽存纳甲之名,绝不知天行为何义,日月交光为何象矣”^{[5]卷5},故“乖于易理”。如京氏火珠林用纳甲,“卦爻合诸时日支干,无往而不验”^{[5]卷5},“虽有不易之理,即数而存者,尽在所弃,是得其半而失其半也,宜乎易理之未易言也”^{[4]卷首上}。胡煦运用考辨方法,依据自己的理解,论述纳甲与易学、术数的关系,这对于易学史长期争论不休的关于纳甲

易学地位问题,做了明确的回应。

二、月体纳甲开天已然,圣人借日月交光以明《易》

在胡煦看来,纳甲之法依据的是一种客观存在的天象,这种天象是一种无文字的自然之易,他把这种天象称为“日月交光”。他说:

日月交光,具此六位时成之象,自开天而已然矣。伏羲仰观而得之,因画出八卦圆图,其中阴阳之微盛始终,莫不与日月交光六位时成之象相合,乾象大明终始六位时成,盖言日也。坤卦西南得朋,东北丧朋,盖言月也。是日月交光见于周易者,已如此也。……然后世相传名为纳甲者,当由伏羲初画时,因日月交光之故而画成此图,则羲图之与天行合也。因借日月交光之旨,以发明此图,则天行之与羲图合也。^{[4]卷首上}

皆由太古圣人仰观俯察,远取物,近取身,知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,因取日月交光之妙,画成先天一图。夫图之画也,既由仰观俯察而出,则日月交光必与图中之旨两不相背矣。文周卦爻既开先天而有之,则发明先天图,因有取于日月交光显然可见之迹,所由有庚甲之说也。夫庚甲者,日月交光,或多或少,或上或下,所见之位也。^{[5]卷5}

所谓日月交光,是就位和象而言,是说由于月体于一个月之内,在天上不同位置受到日光照射,依次而形成六种不同的象。将这六种象排列起来组成一幅天象图画,这幅天象图画不是人为的,而是自古已然的客观的天象,“日月交光,具此六位时成之象,自开天而已然矣”。而这幅图画的实质是呈现在人们视野之中,即人们观察到的月体纳甲。按照胡煦之见,易学中先天图与日月交光有着内在的联系。具体说,先天图是伏羲仰观俯察、远取物近取身而成,其中仰观的天象主要是日月交光,因为在天象中“悬象著明莫大乎日月”,也就是说,在天体中,最耀眼的是日月,是人们最容易感知的,与人们生活和生产密切相关的,故日月交光的六种象成为伏羲先天卦重要依据,即伏羲先天八卦图主要根据这种自然之象——日月交光而画成的。而这种自然之象被他视为先天图原形。他详细地说明了自古已有的、客观存在的先天图原形的排列和形象:月体六种形象与乾坤震巽艮兑酷似,而六象位置排列也是呈圆形两两相对,是先天八卦,“今观日月交光,其朔日之震为一阳,上弦之兑为二阳,望日之乾为三阳,是升阳之候,止有震兑乾三象也。其十六之巽为一阴,下弦之艮为二阴,晦日之坤为三阴,是降阴之候止有巽艮坤三象也”^{[4]卷4}。

伏羲借日月交光自然之象而画出先天图,“夫

图之画也,既由仰观俯察而出,则日月交光”,而其中“阴阳之微盛始终,莫不与日月交光六位时成之象相合”,故纳甲之理“与图中之旨两不相背矣”。文王周公做《周易》时引进纳甲,故《周易》中也呈现纳甲之理。如前面所言“先甲后甲”、“先庚后庚”,又“《乾象》‘大明终始,六位时成’,盖言日也。坤卦‘西南得朋,东北丧朋’,盖言月也。是日月交光见于《周易》者,已如此也”。因此,他提出“圣人借日月交光以明《易》者”¹⁴。他认为,纳甲之说,产生较晚,等有了干支后,“后人传授羲图,因见日月交光各有其位而不相乱也,则遂以六象所在之位,十干所配之方,指而证之,以便传习。是则日月交光乃伏羲明图之具,而纳甲之名,则后人之借资而便习者也,安得不考其实而辨之”¹⁴。

这里有一个问题,胡煦指出伏羲先天八卦图,出自日月交光的月体纳甲,是依据月体纳甲画出,同时,他又提出,先天八卦图是伏羲据河图洛书画出,如他说:

图也者,数之聚,象之设,而理之寓也。河图洛书,天以图示也。先天八卦,圣人以图教也。¹⁴卷首上

道源于天,开于圣,创之者伏羲,继之者文周孔子,始之者河图洛书也。盖图书为天地自然之易,则图画卦之理具其中。¹⁴卷首上

先天无图,文王奚所凭而有卦,则卦之胥出于图审矣。河无图,洛无书,伏羲奚所凭而画卦?¹⁴卷首上

这种说法,好像与胡煦纳甲观点相抵触。然而,若仔细分析,这两种观点并不矛盾。《系辞》说得非常明白,伏羲画卦是受到各种自然现象的启发,“天生神物,圣人则之。天地变化,圣人效之。天垂象,见吉凶,圣人象之。河出图,洛出书,圣人则之”。“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,仰则观象于天,俯则观法于地,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,近取诸身,远取诸物,于是始作八卦,以通神明之德,以类万物之情”。这是说,作为画卦依据自然的天象天体纳甲和地象河图洛书道理相同,如河图洛书用奇偶数显示阴阳,“龙马出河示先天之本,龟书出洛显后天之用,伏羲得之,玩其所负之文,不过自一至十、自一至九之数”¹⁶。天体纳甲则以日月显示阴阳,月体位置在不同位置受日光的形象显示阴阳消息变化。又如二者数理相通,“先天八卦图则河图而画之,除坎离当交接之际为乾坤中交之象,其震之一阳生于坤内,即一奇之生于北内也。兑之二阳盛于东内,即三奇之长于东内也。乾之三阳极盛而外出,即七奇之极盛而外出也。其巽之二阳消于外,艮之一阳尽于外,即九奇之尽于外也。其巽之一阴生于乾内,即二耦

之生于南内也。艮之二阴盛于西内,即四耦之长于西内也。坤之三阴极盛而外出,即六耦之极盛而外出也。其震之二阴消于外,兑之一阴尽于外,即八耦之尽于外也。其上下微盛之定分,内外始终之方位,无一不与河图相肖,所由谓为则图所画者也,是伏羲所画先天亦本河图,而具此循环之义也”¹⁴卷首上。伏羲正是因为观察了各种道理相通的自然现象而画出八卦。因此,胡煦观点合乎《系辞》思想。

三、天体纳甲,阴阳终始,天道运行

按照《易传》的说法,天道运行主要是指日月盈虚、寒暑往来变化,“日往则月来,月往则日来,日月相推而明生焉。寒往则暑来,暑往则寒来,寒暑相推而岁成焉”。(《系辞》)“日中则昃,月盈则食,天地盈虚,与时消息”。(《丰·象》)无论日月寒暑,还是天地自然,其实无非是阴阳变化。日是阳,月是阴;暑是阳,寒是阴;天是阳,地是阴。这种阴阳消长,从结果看是终始相互更替,周而复始,即阳之终始,阴之终始。阳之始,则阴之终;阳之终,则阴之始。《易传》经常用终始表达天道,如《蛊·象》曰“先甲三日,后甲三日,终则有始,天行也”。汉儒从《易传》出发,融合易学与自然科学,以卦气、爻辰、天体纳甲描述了天道变化规律,建立了偏于天道的象数易学体系。就纳甲而言,汉儒魏伯阳天体纳甲说,以月体阴阳终始解说丹道火候:“三日出为爽,震受艮西方;八日兑受丁,上弦平如绳;十五乾体就,盛满甲东方。蟾蜍与兔魄,日月气双明,蟾蜍视卦节,兔魄吐精光,七八道已讫,屈伸低下降。十六转受统,巽辛见平明;艮直于丙南,下弦二十三;坤乙三十日,东北丧其明。节尽相禅与,继体复生龙。壬癸配甲乙,乾坤括始终。”¹⁷三国虞翻援道入易,提出纳甲是“易道阴阳之大要”,由于他注重以纳甲解说《周易》,而对于纳甲解说过于简单。

在月体运行变化问题上,胡煦不同于魏伯阳援易入道,而是承袭虞翻传统,以阴阳这个作为连结易学与天文学的概念,非常详尽地论述了《周易》三画之卦阴阳消长与月体变化关系。他指出:“如据日月交光而论,则又谓阳终阳始,盖阴终则必为阳始,阳始则必为阳终也。以阴阳之迭运,其始其终悉属天行故也。”¹⁵卷5月体纳甲“其妙在象之迁移,与卦象之阴阳多寡微盛相等,而不在位之一定”¹⁵卷5。依胡煦之见,天体纳甲本质上是月体在时空中运行而呈现的阴阳终始规律,这种阴阳变化规律与《周易》卦象阴阳符号多寡高度一致,故可以把这种月体运行及其阴阳变化归结为《周易》的阴阳符号的增减和转换。换言之,在胡煦那里,《周易》三画之卦,已

经不再是抽象的阴阳符号,而是客观的月体在不同时空中的标识。

乾为纯阳,坤为纯阴,震一阳居二阴之下,坎一阳居二阴之中,艮一阳居二阴之上,巽一阴居二阳之下,离一阴居于二阳之中,兑一阴居于二阳之上。在八卦中,乾坤为父母,坎离为乾坤之交,乾中有坤为离,坤中有乾为坎,“坎离者,乾坤之中交也。故坎曰中满,犹云坤而中满也;离曰中虚,犹云乾而中虚也。坤而中满,则仍是含胎之坤,后此无穷妙用皆由坎中一阳发生而出,故坎离之退处无为,仍是乾坤之退处无为而已^{[4]卷3}。坎离“在天为日月”,月体纳甲说的是日月关系。因此,阴阳终始即是乾坤阴阳终始,一阳始于震终于艮,一阴始于巽终于兑,“据甲而论,则谓阴终阴始,阴终甲之前,阴始甲之后也。据两体而论,则谓阳终阴始,阳终艮,阴始巽也^{[5]卷5}。“震艮夹坤于北,一为阳始,一为阳终^{[4]卷首上}。这种阴阳终始,胡煦有时称为得与丧,虚与实,有与无。他认为,《周易》“爻虚无得丧,而言终始先后,“阳爻实而可稽,则先庚后庚便言有无,其实得丧、有无、终始皆一义也^{[4]卷4}。“阳实而阴虚,阳有而阴无,实而有者易见,虚而无者难知。《周易》“贵阳贱阴,非故贱之,非故贵之,其虚实有无之义本如是耳。……知用得丧、有无、终始六字之故,全部《周易》了然矣^{[4]卷4}。不管终始,还是得丧,讲的都是阴阳消长的周期,这个周期展开,就是阴阳两种势力彼此消长、对峙、融合和流转。用八卦表示,由震而兑、而乾、而巽、而艮、而坤。由震到乾是阳爻递增阴爻递减,以示阳长阴消;由巽到坤是阴爻递增阳爻递减,以示阴长阳消。由震到坤,再由坤到震,周而复始,循环往复。

在胡煦看来,阴极阳生,震由坤而生,一阳生于坤下为震,故震为阳始。他指出:

全晦既象纯坤,若使坤体不纯,下面忽露微阳,是为震象。必在三日之昏,此时月之离日几三十度,日入而月见,其体必在西南,西南庚方也,庚方初见震象,故遂以西南字代震字,所以谓为西南得朋。得朋谓一阳之生也,三阴为坤,坤生一阳为震,震为阳始,艮为阳终。兼此两象,始显纯坤之体。^{[4]卷4}

夫坤本无阳,而言得朋,是坤已转而说入震,震已得阳,而复曰先庚,是震又转而说向坤,正谓阴阳两不相离,阳必从阴极生也。^{[4]卷4}

用纳甲说理解和解说“西南得朋”,始于虞翻,虞翻把“朋”解释为二阳,“二阳为朋”,兑二阳,八日兑纳丁,故西南得朋。与虞氏不同的是胡氏把“朋”理解为一阳生,然而,“坤本无阳”,而言“西南得

朋”,说的是“三阴为坤,坤生一阳为震”,即坤已转换为震,震纳庚为“西南得朋”。进而由坤与震关系论证了“阴阳两不相离,阳必从阴极生”的观点。若以有无关系言之:“震象未见,犹然黑质,故以为初之无。震象既成,渐就二阳,故以为终之有。是初终二字专言震之前后,而有无二字则专从所得之阳光起见。又以震之与坤,正属阴阳相接之限,故以有无分别之,盖阴无而阳有者也。^{[4]卷4}

其中有个无法回避的问题,即震纳庚,而“先庚三日,后庚三日”之辞则在巽卦,不在震卦。胡煦认为,“先庚三日,后庚三日”虽在巽卦,其实讲的是震,即巽内藏伏震,“先庚三日,后庚三日”指巽卦内外伏,震之先为坤,震之后为兑。他说:“三日出庚义,见前‘得朋’条下,乃‘先庚’‘后庚’。不言于坤,不言于震,而独说入巽卦,何也?曰:为贵阳,故言震,《周易》“贵阳,《杂卦》所由曰:‘巽伏也。先庚三,内震也。后庚三,外震也。三之先,指纯阴之坤,三之后,指二阳之兑,所以明此一阳之由来,与此一阳之进盛也。’“先庚三日,已说向纯阴之坤,是巽下初萌之微阴所由极。后庚三日,斯渐入二阳之兑,是巽上就消之二阳所自来,故言巽即言震也。^{[4]卷4}

“三之后,指二阳之兑”,是说“先庚三日”,震纳庚,庚先为坤,“后庚三日”在庚后为兑,由震转入兑,兑纳丁。他又说:“月至八日,昏见丁方,下面已生二阳,上面犹存一阴,其象为兑。^{[4]卷4}但从月体看,“此时阴阳各半,宛若仰弓,名曰上弦”。这与“二阳一阴”的兑不相似。对于这个问题,胡煦认为,《周易》“原无阴阳各半的三画之卦,无奈则‘取象于二阳之兑,为以初中未分之,则二阳之兑正在一阳三阳之中,故以为阴阳各半之象^{[4]卷4}。”

三阳长于坤阴为乾,由兑转入乾,乾为三阳。乾纳甲,“月至十五,昏出甲方,三阳全备,其象纯乾^{[4]卷4}。乾表示阳全盛,这个全盛的阳仍然与阴相关联,即阴全消退后产生盛阳,盛阳产生后又有阴产生,“今以阴阳之迹考之,十四之夜尚有微阴,十六之晨复露微阴,自十五之昏,乾象始满甲方^{[4]卷4}。“十四之夜尚有微阴”说的是由兑转入乾;“十六之晨复露微阴”说的是由乾转入巽,一阴长在乾下为巽,巽纳辛。如他所言“至十六平明,巽象已见辛方,其中恰有六时可配六爻,则是先甲三日即指十五之昏前,后甲三日即指十六之晨后,此一夜所得正是六时。以象观之,既与盈亏之理相合。以数考之,亦与先后三三之旨相符”^{[4]卷4}。

二阴长在乾为艮,由巽转入艮,艮纳丙,“月至廿三,晨见丙方,二阴在下,一阳在上,其象为艮。此

时阴阳各半,宛若覆弓,名曰下弦^{①4卷4}。

三阴长在乾为坤,由艮转入坤,坤纯阴无阳,坤纳乙。“自下弦之后,二阴益进,一阳就终。至三十日,月出乙方,纯阴无阳,其象坤。是阳光之尽必由艮而及坤,而月之本体,亦必趋及艮方而止。艮东北也,所以谓为东北丧朋^{①4卷4}。

因此,月体“消息相循,盈虚迭运”,无非是乾坤阴阳周流消息;反之亦然,乾坤周流阴阳消息,正是月体运转盈虚消长。天体纳甲之说,反映的自然界阴阳推移变化之道,乾坤阴阳消长之理。“夫乾之极盛而阴终始之,坤之极盛而阳终始之,虽曰阳必交至于阴,阴必交至于阳,然阴不终,不知后之为乾,阴不始,亦不知前之为乾也。阳不丧,不知后之为坤,阳不得,亦不知前之为坤也。阴阳两不相离,故乾坤本位,内外各止六爻而不相越也。或曰纯乾之象,故为六时。若使纯坤之象见于晦日,而亦止六时。则初一之昏,即当见月矣^{①4卷4}。

最后胡煦把《周易》概括为阴阳之书,重申了庄子“易以道阴阳”的观点,并提出阴阳是理解和把握《周易》核心的关键:“第易之为书,无越阴阳两义,日月则其象也。进退往来盛衰终始,言日月即言阴阳也。^{①4卷4}“盖《周易》止是发明阴阳之书,阴阳出于太极,贯乎五行,通乎八卦,周乎六十四卦,未有能离者也。不究阴阳,安识图与卦爻之旨?^{①4卷4}

四、胡煦纳甲说的易学意义

胡煦纳甲学说有重要的学术意义。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:

其一,如前所言,纳甲说自魏晋以后遭受了冷漠、讥讽、责难和种种不公平的待遇,尤其纳甲与数术合流之后,被普遍认为它不符合圣人之意,非易学之正宗,是术数,是易学之别传。生活在清初的胡煦,通过探索纳甲起源,区分纳甲与数术,提出了纳甲起源早于术数,为明易而设,再次确立了纳甲说在易学中的地位。

胡煦纳甲说,与汉代象数易学别无二致,是借助于《周易》符号描述自然变化规律,属于偏于天道的象数之学,即自然哲学。但他的纳甲说已经杂糅了宋代象数易学的内容,如他发现了月体纳甲排列,恰是伏羲先天图,大胆地提出了先天图本之于客观的天象——日月交光的纳甲,进而又说明客观月体纳甲是易之源,纳甲之法为明易而设,从而将汉宋之易融为一炉,这就是胡煦易学创新点之一。

更为重要的是他紧紧抓住中国哲学或易学中阴阳、有无、终始、虚实、得丧、消息等重要的概念,对月体纳甲做了详尽考证和细微阐发,形成了易学史上

融象数理为一体的、最丰富、最完备的纳甲学理论,并从这种纳甲学理论与其他象数学说中引申和阐发出天地之道、人伦之理,建构其以自然哲学为基础的道德哲学体系。因此胡煦纳甲说和整个易学无论是从思想内容上,还是从理论深度上远远超过汉易。

如牟宗三评价胡煦易学所言,“汉易是通过卦爻象数之路,以观阴阳气化之变,至清初康熙年间胡煦崛起,仍是走此路,不过讲得更自然,更妥贴,更贯通。从此方面讲,他们所展示的境界是卦爻象数下中国式的自然哲学,而兼示出人事方面之许多道德函义^{①815}。“清人考据训诂,于学术、道术无足称,而惟于易学,则得两人焉:一曰胡煦,一曰焦循。此两人确是不凡,都可以说是易学专家。……此两人的易学都可以说是学人专家的易学,皆以象数为出发点,但不是汉人的象数。汉人的象数,于解经则嫌琐碎著迹,不成条贯;又于经外有一底子,由阴阳、讖纬、灾异一整套而成者。他们两人对于这些都能荡涤廓清,独辟蹊径^{①9148}。牟先生把胡煦视为超越汉儒易学、清代最有思想的易学家之一,其评价虽带有感情色彩,有溢美之嫌,但是确实看到胡煦易学创新或精辟之处及其对于易学史的贡献。

其二,为清代易学转形奠定了基础。清初学术是汉宋兼采,其实际是批判宋学酝酿汉学、由宋学转向汉学,清初易学体现了这个特点。梁启超说:“清代易学第一时期工作,专在革周邵派的命。^{①101175}清初官方易学是尊崇程朱易学,程子言理,朱子推崇程子的理,精于义理,疏于文字训诂,不废象数。但朱子等人的象数,已不是汉儒象数之学,更多指图书之学和先天之学,即使言卦气互体纳甲五行爻辰,也多流于丹道方技。清初大学士李光地奉诏纂修《周易折中》,先取朱子《本义》,再取程子《易传》,“折中其异同之致”,然后以程朱易学为标准取舍百家易学,即康熙所言的“传义以外,历代诸儒各有所发明,足以佐证传义所未及者,又参合而研核之,并为折中^{①11夙例}。

胡煦生活在清初,参与撰写《周易折中》,不能不深受时代学风影响,其易学大致属于程朱,其义理多言道、理、性、太极、诚等,其象数多言先天后天河图洛书。但与《周易折中》不同的是开始重考据方法。如其纳甲说就是例证。他用《周易》卦爻辞证明当时已有纳甲,用《彖辞》“大明终始”证明日月交光。虽然这些考辨,不能令人置信,但是他已经开始用考辨方法研究易学,说明在胡煦易学内已经孕育着清代朴学易。

同时,胡煦易学虽然大致属于宋儒义理易学,但

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,却与程朱易学相差甚远,如他不同意朱子《周易》本为卜筮之书,也不同意将伏羲文王孔子易学割裂,反对朱子倡导卦变说等。在纳甲问题上,朱熹否定纳甲为易学正宗,认为《参同契》所言纳甲,“虽非为明易而设,然易中无所不有,苟其言自成一说,可推而通,则亦无害于易,恐不必轻肆诋排也”¹²卷³⁸。而《周易》蛊卦巽卦文辞“先甲”“后甲”,“先庚”“后庚”,也非纳甲,而是“古人祭祀多用先庚先甲”¹²卷^{70,73}。而胡煦把纳甲说视为易学重要内容,提出纳甲“设之以明易”,并认为《周易》古经蛊卦和巽卦的“先甲”“后甲”、“先庚”“后庚”之辞是当时文王做《周易》已用纳甲之明证,显然与朱熹观点针锋相对。他承认纳甲,运用纳甲解易,有复归汉易之意。

这样一些易学见解,虽然未像同时代黄宗羲、毛奇龄、胡渭等人批判程朱易学那么尖锐和激烈,但已经感觉到,胡煦易学有一种转向的趋势,即由程朱易学内部开始孕育着向考据易学转变。

参考文献:

[1] 朱震. 汉上易传卦图 [Z] / 四库全书 (第 11 册). 上

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.

- [2] 朱熹. 朱熹文集 [M] / 朱熹集. 成都:四川教育出版社,1997.
- [3] 俞琰. 读易举要 [Z] / 四库全书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.
- [4] 胡煦. 周易函书约存 [Z] / 四库全书 (第 48 册)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.
- [5] 胡煦. 周易函书别集 [Z] / 四库全书 (第 48 册)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.
- [6] 胡煦. 周易函书约注 [Z] / 四库全书 (第 48 册). 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.
- [7] 任法融. 周易参同契释义 [M]. 西安:西北大学出版社,1993.
- [8] 牟宗三. 周易的自然哲学与道德涵义 [M]. 台北:台湾文津出版社,1988.
- [9] 牟宗三. 五十自述 [M]. 台北:台湾鹅湖出版社,1989.
- [10] 梁启超.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[M]. 太原:山西古籍出版社,2001.
- [11] 李光地. 周易折中 [M]. 成都:巴蜀书社,2006.
- [12] 朱熹. 朱子语类 [M]. 北京:中华书局,1994.

胡煦有关《周易》与其他经书关系述论

汪学群

(中国社会科学院 历史研究所,北京 100732)

胡煦,字沧晓,号紫弦,河南光山人。生于顺治十二年(1655年),卒于乾隆元年(1736年)。他生有异禀,知嗜学,多深沉之思,尤深于《易》。年十八岁以后,志益奋,功益专,凡古人说《易》之书,靡不贯通以求合四圣之旨,遂以易学终其身。他的主要易学著作有《周易函书约存》、《周易函书约注》、《周易函书别集》等,总称为《周易函书》。康熙四十九年(1710年)八月,他自序《周易函书约存》,谓“自髫龄笃嗜《周易》,研精四十余年”¹¹自序。翌年,李去侈也作序说:“胡先生博极群籍,覃精易理,所有裨于圣学圣道,寝食以之者四十年,积极而生明,积明而生悟。”¹¹序雍正九年(1731年)春,顾成天为《周易函书约存》作序,有“先生貌古心夷,气和神皎,年七十有七矣”¹¹序一语。其间又有康熙五十六年(1717年)自序。雍正二年(1724年)初秋,蔡衍鋈为《周易函书别集·篝灯约旨》作序。综上所述,可

知《周易函书》虽初成于康熙四十九年,但他自幼年就开始读《易》,一直到晚年,覃思不辍。

—

胡煦的易学内容十分丰富,拙文的重点则在于探讨他有关《周易》与其他经书关系的论述。胡煦分析《周易》与其他经书关系的论述很多,兹举几条有代表性的加以评论。他以为“圣人之道,大本大用,尽发泄于《周易》,其余诸经皆道之散见者耳”¹²卷¹¹。“《六经》、《四子》之书皆圣道之散见,而《周易》其大本也。《六经》、《四子》书由整处说到散处,是一本而万殊者也。故必详细分疏,然后可以牖庸愚之知见。《周易》由散处说为整处,是万殊而一本者也。故必合万有不齐归于至一,然后可以极盛德之高深”¹²卷¹¹。“《六经》之文虽不同体,以理为主耳。理不足,斯以其文胜之,诸子得专家莫不如是,然文之茂,理之塞矣”。“须知《六经》、《四子》